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知识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崭新课题。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特别是即将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使知识资源充分为知识生产服务,是大学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者: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

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制度的建立

黎琳

蔡元培从1917年开始到1930年断断续续任职北大校长约11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时代是北京大学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制度形成的代表性时期。在此我们不禁深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作为校长的蔡元培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北大的大学制度,从而也形成了中国的大学制度?我们不妨对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1917年他接任时的校况是:大多数学生不认真读书,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教员也是不学无术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他上任伊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北大的大学制度。其主要特点是:

其一,实行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蔡元培反对校长独断专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的《大学令》有“大学设评议会”的规定,但未能切实施行。1917年北大《评议会章程》中规定“大学内部规则”、“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学生风纪”等重要事项,须经评议会通过,才能付诸执行。评议会组成成员为校长、各科学长、各科教授,每科两人、自行互选。评议会对各种议案的审核和讨论,都实事求是而不讲情面。一经决议,蔡带头服从,绝不以校长权势凌驾于集体决定之上。1919年,北大评议会又对

有关条文进行完善和修改。

其二,以高水平师资为立校之本,让教师拥有学术自由的权利。蔡元培上任后“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的兴会”。如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沈君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随后,蔡元培在北大各科进行改革,不拘一格、打破资历限制,聘请了一批饱学之士担任北大教授,他们中大部分都很年轻,大多在三十岁左右。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尚、朝气蓬勃的英年才俊为骨干,带动全校学术风气的好转。在兼容并包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者,仍延聘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为了更好地吸取世界最新科学成果,蔡元培对于杰出的外国专家,礼聘之惟恐不及。欧美著名学者罗素、杜威等相继来北大并巡回全国各地讲学,大大浓厚了当时的学术空气。

其三,实行选科制。1917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决议获得通过并交北大试办。北大选科制规定:学生修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不拘年限。如本科须修满80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生入校时,应择定教授一人为导师。这一选科制,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迅即被全国大学采用,并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前后约有十一年,真正在校主持校务不过四年有余。尽管为时不长,但他在北大所奠立的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及大学制度却影响深广。正如顾孟余所言:“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

划以进行者，则以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任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蔡元培的学养以及他吸收西方大学先进制度所致。蔡元培(1868—1940)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举人、进士，任翰林编修。1908年赴德进入历史悠久的莱比锡大学主修哲学，留学三年修学课程计40门，范围遍及哲学、心理学、文学、自然科学发展史等等，涉及主要的人文学科。留学期间，蔡元培十分注意研究德国的教育制度，他曾将已故柏林大学教授巴留岑的《德意志大学》总论部分翻译到国内发表，全面介绍德国的大学制度。蔡元培在德国学习期间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为他后来回国主持教育改革、建立北大的大学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蔡元培建立的大学制度融汇了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大学理念的精华，成功地把这些精华运用到中国大学的改造中，形成北大中西合璧的大学制度，这一大学制度对北大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杜威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分，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在北大创造的大学制度主要体现了他的大学观：大学肩负振兴民族的使命，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蔡元培在北大成功的教育实践及建立的大学制度对今天建立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大学校长是大学的“舵手”，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鲜明的办学思想。北大因蔡元培而兴，表明大学校长作用之大。新中国大学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再也没有出现像蔡元培那样的校长，为什么？这或许可以引起我们深思。时间无法倒流，历史是一维的，大学校长如果没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把办好大学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投入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就无法当好校长。好的校长还要有鲜明的、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大学才有明确的航向和前进的动力。可是，今天不少大学校长确是学有所长、专业成就很高，但是对大学追求、办学理念缺乏深刻的思考，过多沉溺于琐碎的事务主义，要不就是刻板地按上级文件办学，或者是不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模仿、追赶潮流。

启示之二：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给学术研究以更自由的空间。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教师，尊重学者，尊重大学的主体——大学人，给他们权利，给他们民主，给他们以自由。大学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学术自由是学术和科学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尊重学术自由以及尊重教师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之义。可是，今天许多大学办得不像学术机构，而近于行政机关。大学里民主空气稀薄，长官意志浓厚；大学教授不像学校的主人，而像臣民；大学中行政权力过于庞大，而学术权力过于弱小，甚至成为一种装饰品。在建立现代中国大学制度时，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和弊端，把学术权力还给教授和学者，给学术发展以更广阔的自由空间。

启示之三：建立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合理地吸收西方大学制度的精华，而不能照搬西方大学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都是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

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外动因分析

潘 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基本而灵活的现代大学制度。本文试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及其内涵出发,进一步探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外在动因

1、新经济和全球化驱动。

新经济和全球化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趋势的主要特点: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际间科技、经济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产业技术升级加快,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三是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产

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四是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础作用愈益突出。以往的资源型经济是稀缺经济,而知识经济却打破了这一立论。

另外,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必将要求高等教育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革新。教育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明显优势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人才培养不仅要适应国内市场和国内建设的需要,还要适应国际市场和竞争的需要;同时教育要以国际化来应对经济全球化,不应片面地追求与国际接轨,而是要更加开放,进而取长补短。

2、科技与人文精神统一发展的要求。

文化的传递、内化和创新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大学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文化,其包含求上、求善的人文精神和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国际化、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的世纪。举例

果一种知识和文化是外来的、移植的,那么它就必然要经过选择、接纳、消化、吸收、扬弃等一系列“本土化”过程。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大学校长群,基本是受过西方教育、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传播者,输入了西方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而言,突

出表现为确立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价值观。然而,他们在接受西方某些大学观念的同时,也很保护国粹,固中国传统之根。他们在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问题。今天,在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作者: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